

## 荷蘭東印度公司筆下

### 「歪哥兼帶衰」的雞籠Kimauri人 Theodore<sup>\*</sup>

康培德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

---

\* 本文原發表於2010年10月27至28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的「東亞海域與臺灣——慶祝曹永和院士90壽誕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回眸曹永和』特展」，經評論人詹素娟教授、與會學者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修改而成，並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洪偉豪的地圖繪製協助，文中的錯誤、漏失等則為作者的責任。

## 摘要

本文嘗試重建一受洗名為Theodore的17世紀北臺灣原住民圖象。文章重點在Theodore如何在歐洲人蒞臨北臺灣時竄出、以及如何藉由擔任荷蘭人與噶瑪蘭人間的中介而得利。除了作為臺灣原住民人物史的研究案例外，文章亦用其故事作為北臺灣海洋史的縮影，並嘗試在此脈絡下為北臺灣歷史地名考證的爭論，提出較周延性的解釋。

關鍵詞：原住民、北臺灣、早期臺灣史、馬賽人

## 壹、前言

隨著國內學術界日益重視早期臺灣史議題，屬荷蘭、西班牙等歐洲系人群活躍的荷西時代研究，其主題亦從先前的政治、經濟等重心擴及社會與文化面，如社會文明化、<sup>1</sup>儀式與權力、<sup>2</sup>文化變遷、<sup>3</sup>甚至歷史記憶<sup>4</sup>等議題；其中，貫穿這些不同研究主題的靈魂，則是活躍於當時舞台上的歷史人物。

至於近年來早期臺灣史中有關人物史的研究，討論的對象與議題也日趨多元。從人物的族群或文化背景來劃分：歐洲人部份，如荷蘭東印度公司第三任駐臺長官納茨（Pieter Nuyts），這位眾所周知的濱田彌兵衛事件主角之一，在歷任公司職員中屬罕見的「高學歷」背景，但也留下了60餘名部屬慘遭原住民屠殺的空前絕後記錄；其生平，從出生、受教萊登大學、出使日本、任職臺灣、拘留日本，到返回荷蘭、擔任熱蘭（Zeeland）省Hulst市長的一生，有了完整的介紹與評價。<sup>5</sup>唐人部分，除了鄭芝龍、鄭成功、郭懷一等曾出現於戰後國內歷史教育中的人物外，<sup>6</sup>亦有針對往來臺海兩岸的貿易商亨萬（Hambuan）進行考證與討

- 1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臺北：前衛，2004年）；Chiu Hsin-hui,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the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Brill, 2008)。
- 2 Tonio Andrade, "A Political Spectacle and Colonial Rule: the Landdag on Dutch Taiwan, 1629-1648," *Itinerario* 21.3 (1997): 57-93.
- 3 John Robert Shepherd,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Seventeenth-century Siraya*.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 no. 6 (Arlington, V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 4 翁佳音，〈歷史記憶與歷史經驗：原住民史研究的一個嘗試〉，《臺灣史研究》3.1（1996年）：5-30；又收於氏著，《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年），頁15-41；康培德，〈紅毛先祖？新港社、荷蘭人的互動歷史與記憶〉，《臺灣史研究》15.3（2008年）：1-25。
- 5 Leonard Blussé, "Pieter Nuyts (1598-1655): een Husterse burgermeester uit het Verre Oosten," *Zeeuws Tijdschrift* 43.6 (1993), pp. 234-241.
- 6 如Leonard Blussé, "Minnan-jen or Cosmopolitan? the rise of Cheng Chihlung alias Nicolas Iquan," in E. B. Vermeer, ed.,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eiden: Brill, 1990), pp. 245-269; Johannes Huber, "Chinese Settlers against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rebellion led by Kuo Huai-i on Taiwan in 1652," in E. B. Vermeer, ed., op. cit., pp. 265-296.

論。<sup>7</sup>至於原住民人物方面，有對1630年代中葉遭東印度公司大肆清鄉後，殘存的小琉球人遺族Jacob Lamey的生平報導，特別是Jacob在荷蘭的婚姻；<sup>8</sup>以及曾隨日本生意人遠赴扶桑、並成為濱田彌兵衛事件導火線之一的新港社要人理加（Dicka）、或1630年代上半與東印度公司對抗的麻豆社要人大加弄（Takaran）等。<sup>9</sup>這些歷史人物的「再出土」，除了豐富我們對早期臺灣史的理解與詮釋外，也為原本距我們遙遠的歷史舞台加注了鮮活的生命。

本文即基於早期臺灣史研究中有關人物史的研究脈絡，嘗試以北臺灣雞籠Kimauri社土著Theodore為例，處理當時殖民地底層的原住民人物史。並進一步將其略帶戲劇性的生平起伏，置於「臺灣島史」的概念下進行討論與理解。<sup>10</sup>

## 貳、從通譯到頭人

Theodore（Theodoor）這源自希臘的名字，意思是上帝的贈禮，係基督徒慣用的人名，很顯然這不是北臺灣原住民的自稱，而是來自歐洲人的稱呼。如同位東北角的三貂（St. Jago）社，係源自西班牙人的他稱，當地人則自稱為Kiwannoan；眾所周知熱蘭遮城一帶的新港（Sinckan）社，係福建唐人的稱法，當地住民則稱為Tagloulou（Tachloeloe）。我們的故事主角Theodore，應當是當時在北臺灣傳教

7 楊國楨，〈十七世紀海峽兩岸貿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書試探〉，《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2期（2003年）：145 - 172；翁佳音，〈十七世紀東亞大海商亨萬（Hambuan）事蹟初考〉，《故宮學術季刊》22.4（2005年）：83 - 102，又收於氏著，《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年），頁172 - 173、181 - 205。

8 Natalie Everts, "Jacob Lamey van Taywan: an indigenous Formosan who became an Amsterdam citizen," in David Blundell, ed., *Austronesian Taiwan: linguistics, history, ethnology, and prehistory*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pp. 151 - 156.

9 翁佳音，〈新港有個臺灣王——十七世紀東亞國家主權紛爭小插曲〉，《臺灣史研究》15.2（2008年），頁1 - 36；康培德，〈理加與大加弄：十七世紀初西拉雅社會的危機〉，葉春榮（主編），《建構西拉雅研討會論文集》（新營：臺南縣政府，2006年），頁81 - 96。

10 有關「臺灣島史」的概念，請參考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收於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頁445 - 449。

的西班牙神父給的名字，至於其本名是什麼，如同文獻中許多冠上歐洲人名的原住民，對三、四百年後的我們而言，則不得而知了。

文獻中首度出現Theodore，係在1642年10月荷蘭東印度公司戰地指揮官Johannes Lamotius的雞籠和淡水征伐日誌中；當時，荷蘭人剛剛戰勝北臺灣的西班牙人，為了在雞籠城寨（San Salvador）一帶立下威信，將自隊長Hendrick Harroussé處逃跑的奴隸Jan Pilet處死，並監禁12名牽連的三貂社人。隔天，Lamotius派員到Kimauri社延請些主要的頭人前來城寨，但對方卻躲入山中；Lamotius乃派隊長彭恩（Pieter Boon）前去追捕對方。之後，Lamotius從這些捕獲的人當中挑出6人，於10月10日公開處以吊刑以為威嚇。這6人是：三貂社長老的兒子Pantochan、Kimauri和Tappari的頭人Sisinjan、三貂社人Tamorij Alonce以及3名未留下名字，只知係用抽籤的方式，從3名Kimauri社人中挑2名，9名三貂社人中挑1名。至於其他的俘虜，在判決執行後獲准回到其村社。Theodore即在這Kimauri和Tappari頭人出缺之際，由指揮官Lamotius在雞籠公開宣告，身分由公司「忠誠的」通譯轉成替代Sisinjan、代表Kimauri和Tappari兩地的頭人。<sup>11</sup>

擔任驚魂甫定的北臺原住民村社頭人的Theodore，一開始似乎是Lamotius跟前的紅人。荷蘭人攻克西班牙人的雞籠城寨後，俘虜了115名西班牙人、62名呂宋島的邦板牙基督徒傭兵（Pampanger）、93名卡加揚（Cagajaner）勞工、42名婦女、116名男女奴隸、以及18名兒童，

11 DZII, pp. 33 - 34 ;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I : 1636-1645* (Taipei :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0) , pp. 308 - 309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年），頁33 - 34。  
《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荷文版全套四冊，已先後於1986年、1995年、1996年、2000年出版，分別簡稱DZI、DZII、DZIII及DZIV。見Leonard Blussé, W. E. van Opstall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 1629-1641* (Gravenhage : M. Nijhoff, 1986) ;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Gravenhage : M. Nijhoff, 1995) ;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I, 1648-1655* (Gravenhage : M. Nijhoff, 1996) ;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V, 1655-1662* (Gravenhage : M. Nijhoff, 2000) 。

共446人。<sup>12</sup>原服侍西班牙人的僕役，此時即成為荷蘭征服者的財產。不過，政權交接之際的兵慌馬亂，奴僕趁機脫逃之事時有所聞，前述自隊長Harroussé處脫逃的奴隸即為一例。Theodore在公告為頭人之日，即替公司帶回一名脫逃的圭柔（Cenaer）社少年僕役。這位圭柔社的少年郎，確實身分不詳，係荷蘭人在攻下雞籠城寨時當場虜獲，成了掌旗官Lantsknecht的戰利品，即成為其僕役。少年郎趁機逃回其雙親所在的圭柔社，但為熟悉北海岸的Theodore不知用什麼方式揪了出來，帶回雞籠城寨交給荷蘭人，之後即被囚禁起來。<sup>13</sup>之後，戰地指揮官Lamotius和其一部分部隊離開雞籠，前去佔領淡水。並在遭破壞的西班牙人城寨基礎上，建立一個小防禦工事，確立東印度公司在當地的駐點。此時，Theodore即與熟悉當地語言的荷蘭人通譯Cornelis de Smith一起穿梭於淡水、雞籠兩地，為公司傳遞訊息。Lamotius為了犒賞他，送了一匹棉布（cangan）與2里爾現金，還另支付2里爾請他購買雞隻等物帶去雞籠城寨給Harroussé。<sup>14</sup>

不過，Kimauri出身的Theodore，似乎無法如其前人般，統領Kimauri和Tappari兩地。之後，Lamotius帶兵南下攻打虎尾壠、琅嶠，離開臺灣前往巨港（Palembang），加入公司與位東京（Tonkin）灣鄭氏（Trịnh）王國的聯軍出征廣南（Quinam）的阮朝（Nguyễn）後，相關文獻即未提及Theodore為這兩地的頭人，僅提及他是Kimauri頭人。至於Tappari方面，東印度公司在北臺灣的駐地人員則日益倚靠Lucas Kilas統領當地與淡水河流域沿岸的事務。1644年6月，臺灣議會議長麥爾（Maximiliaen Lemaire）頒象徵村社頭人權威的公司藤杖和花緞（damaste）給Theodore時，即一併提及將同樣的信物與禮品運給在北臺灣的Thomas Pedel中尉，要後者代表公司交給Lucas Kilas，條件是

12 W. Ph. Coolhaas, *Generale Missiven : van Gouverneurs-generaal en raden aan Heren XVII der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deel II, 1639-1655* ('s-Gravenhage : Martinus Nijhoff, 1964), p. 174; Chen Shaogang, *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 : een vergeten geschiedenis* (1995), p. 206;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2000），頁238。

13 *DZII*, p. 34;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34。

14 *DZII*, p. 38 - 39;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38 - 39。



Lucas保證歸順。<sup>15</sup>1646年年中，臺灣長官卡隆（François Caron）又下令頒贈象徵村社頭人的公司藤杖給Lucas Kilas本人，Lucas並在同年9月的淡水河與武勝灣河沿岸的歸順村社、頭人、戶數與土著表單，或是淡水地方會議的頭人與其繼任者的人名備忘錄中，一併與Kilas Chereman同列為Tappari的頭人。<sup>16</sup>

另一方面，我們這位由東印度公司指派頭人職的Theodore，也並未從此就在雞籠一帶坐穩其位置。翌年1643年年初，駐淡水城寨（Fort Antonio）的Pedel中尉，在其駐地日誌中有筆耐人尋味的記錄：日誌中提到雞籠城寨來的信差，因搭乘的舢舨（prauw）在北海岸遇難，獲救後驚歎於淡水城寨一帶住民與荷蘭人關係之友好，對比於雞籠城寨附近住民的不可靠，因為Kimauri頭人Theodore與其大部分的同伙逃往三貂社。也就是因為這理由，士兵Hans Gal為首的信差才冒險走水路前來淡水城寨，船隻也因而觸礁遇難。為了Theodore之事，Pedel中尉還得奉命回覆駐雞籠城寨的少校Harroussé，說明淡水城寨駐地人員與當地住民的關係一向良好。<sup>17</sup>Theodore躲至三貂社的原因，見於同年6月仍駐防於雞籠城寨的Harroussé致臺灣議會議長麥爾的書信；其中，Harroussé控訴Theodore煽動公司的大港奴隸脫逃並給予庇護。東窗事發後，Theodore以去噶瑪蘭收購稻米為由，與其同伙於2月初逃到三貂社。<sup>18</sup>躲藏4個多月後，Theodore前來雞籠城寨懇求寬恕；Harroussé則將他囚禁在城寨，等候大員方面進一步的指示，並看是否要將Theodore和有關此案的文件送至大員那。<sup>19</sup>

針對Theodore的案子，Harroussé本人認為可完全確信Theodore會藉由傑出的表現來彌補其先前作為；因此，Harroussé建議把Theodore關在城寨幾個月，待雞籠一帶的居民顯現出足夠的敬畏之意，且確信Theo-

15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438 - 439.

16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II : 1646-1654* (Taipei :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6) , pp. 109, 111, 124.

17 *DZII*, p. 115;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113。

18 若依前述Pedel中尉的記錄，雞籠城寨人員應在1月底即已獲知Theodore一行人已避往三貂社了。

19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383 - 384, 392.

dore會效忠公司並成為順從的僕人後，然後在其族人的懇求下順勢釋放他，這樣還可贏得居民的民心。<sup>20</sup>

不過，Theodore這近半年所發生的一切，多少對雞籠城寨駐地人員的工作有所影響。先前荷蘭人與位蘭陽平原噶瑪蘭人間的主要聯繫，Theodore扮演了一定分量的中介角色。這段期間Theodore與公司之間關係的緊張，多少影響了噶瑪蘭人對荷蘭人的態度；至於Theodore一行人躲藏於三貂社期間，對荷蘭人所作的描述，以及赴雞籠城寨和談時為Harroussé所囚禁，也影響了三貂社人在這之間的立場。因此，Harroussé可說是為了「消毒」，不得不派出生京都、已在雞籠待了35年、且娶當地Kimauri婦女Insiel Islena為妻的日本人喜左衛門（Quesaymondonne或Jasinto），前往三貂社與噶瑪蘭人那替荷蘭人方面緩頰。<sup>21</sup>至於同年4月隊長彭恩率領的東印度公司哆囉滿探金隊，西班牙人Domingo Aguilar的三貂社籍妻子係通譯人選之一；<sup>22</sup>也是因其三貂社背景，Aguilar的妻子亦一併協助荷蘭人力促留在三貂的Kimauri居民回到雞籠一帶。<sup>23</sup>

暫時跌落谷底的Theodore，卻又因東印度公司對產金區哆囉滿的資訊需求，而獲大員方面公司官員的重視，有了鹹魚翻身的機會。首先，隊長彭恩為了運送淡水城寨建築所需的石灰等建材，於1644年4月抵北臺灣一帶。彭恩抵達雞籠城寨後，除了奉命任令掌旗官Jacob Baers為駐地首長，接替因Harroussé離去而暫代首長職的中尉Krieckenbeeck外，也正式將雞籠城寨的首要稜堡與位山上的圓堡以荷蘭名重新命名，並透過上席商務員歐沃瓦特（Pieter Anthonisz. Overtwater）擬的52條問題，向Theodore詢問有關北臺灣、蘭陽平原、立霧溪口的產金地哆囉滿、以及先前西班牙人與當地住民間關係的資訊。<sup>24</sup>之後，在隊長彭恩的陪同下，Theodore前往大員。

20 Ibid., pp. 392 - 393.

21 Ibid.

22 *DZII*, pp. 139 - 140 ;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363-364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138 - 139。

23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364 - 365, 380.

24 *DZII*, pp. 255 - 263 ;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 436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268、270 - 276。



## 參、首次大員之行

Theodore於1644年年中的大員之行，與前一年其本人因案囚於雞籠城寨無關，而是大員方面對產金區哆囉滿的資訊需求；但是，Theodore也不是第一位為此而前往大員的北臺灣住民，前述的Domingo Aguilar與其三貂社籍妻子於1643年即曾奉命南下。<sup>25</sup>不過，從文獻中來看Theodore此行應該大有所獲；大員之行除了讓他本人從當時東印度公司在臺行政最高首長麥爾手中親獲象徵村社頭人權威的公司藤杖，以及花緞為禮物外，Theodore本人還與公司談妥一筆生意、並討回其為駐北臺灣荷蘭人取走的財物。<sup>26</sup>

Theodore與麥爾之間的生意協議，係Theodore與其Kimauri族人每年將運送一定量的煤礦至雞籠城寨附近的海灘，提供給東印度公司。Theodore要求一次運送10大桶（balien）的煤，公司就得支付2大里爾；麥爾則同意先以400桶為交易量。至於荷蘭人取走的財物，指的是二年前西荷雞籠之役時，戰勝的荷蘭人一方所搜括而來的；當時Theodore的唐人赤珠落入掌旗官Jacob Baers手中。麥爾答應Theodore所請，下令Baers將赤珠歸還Theodore本人。其他搜括而來的珠子、甚至虜獲的男孩，則暫時由駐在淡水的Pedel中尉保管，靜候大員方面進一步的指示。<sup>27</sup>

回到雞籠的Theodore，有了臺灣議會議長的撐腰，氣勢馬上有點不一樣。中尉Pedel於6月回覆麥爾的書信中，敘及掌旗官Baers提到：Theodore非常感謝他對其大員之行的協助，Theodore一抵達雞籠，就會負責處理赤珠的事。對比二年前Baers取走Theodore的財產，還真的有了轉變。至於Pedel方面，其本人正忙於處理上級交付的貢稅徵收任務；但Theodore告訴Pedel，他本人不需立即繳納貢稅，因為麥爾「沒有下令他這麼做」。<sup>28</sup>

雖然1644年年底甫上任臺灣長官職的卡隆（François Caron），對

25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383, 394.

26 Ibid., pp. 437 - 439.

27 Ibid.

28 Ibid., pp. 448, 450.

Theodore的評價也不錯，認為Theodore的西班牙語流暢，本人曾造訪哆囉滿15次，其與隊長彭恩一起蒞臨大員城堡時所提供的哆囉滿資訊，讓公司對產金地的了解更多，超出其他任何人所能提供的資訊；<sup>29</sup>不過，對公司派駐北臺灣的人員來說，在處理當地事務時，Theodore的地位並非完全不可取代。

#### 肆、北臺灣的中間人

1640年代中葉，駐雞籠、淡水城寨的荷蘭人，在處理北臺灣駐地轄境內的當地事務時，若按地理區塊來看，可切分成南崁地區、臺北盆地淡水河流域沿岸、東北角海岸與蘭陽平原、以及因其出產金礦而特別獨立出來的花蓮立霧溪口的哆囉滿。與Theodore本人相關的地區，係後二塊。若論及與Kimauri、Tappari等屬馬賽人活動的地區，則得再加入臺北盆地淡水河流域沿岸。這些地區，駐北臺荷蘭人係依賴不同的在地中介人，居中斡旋於荷蘭人與當地人之間。

三貂社方面，前述西班牙人Aguilar的三貂社籍妻子，係此一時期文獻中的常客。這名三貂社婦女，係Kimauri頭人Kilas sa Romana的姪女。據載，透過其家族網絡，她與Aguilar擁有硫磺丘和一個峽谷的所有權，該處可發現優質的硫磺泉。<sup>30</sup> Aguilar的三貂社妻子，除了前述協助荷蘭人擔任哆囉滿之行的通譯、協調勸回隨Theodore躲至三貂社的Kimauri社人外，亦曾協助雞籠城寨駐地人員前去淡水一帶的村社，收購稻米和其他貨物。<sup>31</sup>

Tappari方面，前述的Tappari社人Lucas Kilas因地利之便，成為公司處理臺北盆地淡水河流域沿岸的重要中介人物；如1644年年中，駐

29 見卡隆給總督范迪門（Anthonio van Diemen）的書信，1644年10月25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485, 489；甘為霖（William M. Campbell）的譯本則省略此段。見William 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ptions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1903), pp. 203 - 205.

30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319, 324.

31 Ibid., pp. 392, 393.

淡水的Pedel中尉係透過Lucas，協調聯繫擁有400餘人、在淡水河流域沿岸算大社的毛少翁社首要頭人Gommon，方順利讓淡水所有村社承諾以鹿皮繳納貢稅給公司。<sup>32</sup>1646年年初，Lucas Kilas替淡水城寨從淡水河沿岸村社那，以40里爾半的價格購得4,020磅稻米；年中，還隨士官Carsman與一名南崁社通譯一同巡訪南崁、竹塹、加至閣一帶的未納貢稅村社。之後，公司的淡水河沿岸稻米交易與桃竹苗巡訪，都可見Lucas Kilas參與其中。<sup>33</sup>

至於Kimauri社，除了我們的主角Theodore外，前述Kimauri族人的日本女婿喜左衛門，亦是東印度公司的滿意人選。早在Theodore因煽動公司奴隸脫逃而受牢獄之災之際，喜左衛門已前往大員覲見臺灣議會議長麥爾，並主動要求受雇於東印度公司。麥爾答應所求，並要求當時駐雞籠的Harroussé少校給予其通譯或駐地其他職位。事後，Harroussé也對喜左衛門頗有好評，說當地人——特別是Kimauri社人——非常喜歡這位已過花甲之年的日本女婿，由他代表公司轉告或下令的事情幾乎都可完成。<sup>34</sup>而Kimauri社的人選，尚有曾陪同隊長彭恩前往哆囉滿、並經由卑南覓前往大員的Bartholomeus等。不過，上述這些人物，從文獻記載中的各人活動來判斷，係Lucas Kilas與喜左衛門二人，在公司交付的工作中與Theodore的重疊度最高，特別是噶瑪蘭與哆囉滿的任務。

### 伍、出使噶瑪蘭與哆囉滿

1645年春天，當時派駐淡水城寨的下席商務員Jan van Keijssel，決議派Theodore與一、二名荷蘭士兵前往蘭陽平原通知噶瑪蘭各社要人，應於25日後前來北臺荷蘭人駐地，繳納當初歸順時所答應的貢稅。喜左衛門自大員返抵雞籠後，也加入此一催繳貢稅的任務；不過，效果不

<sup>32</sup> Ibid., pp. 448, 449.

<sup>33</sup>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49, 51, 106 - 107, 117 - 118, 121 - 123, 146, 148 - 149.

<sup>34</sup>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382, 431 - 432.

彰，甚至傳出已納貢的居民，直言道：假如那些應納貢而未納的人沒受到處罰，他們下次也將拒繳。<sup>35</sup>

同年夏天，下席商務員Jacob Nolpé接任淡水城寨首長職後，噶瑪蘭人與東印度公司間的關係依然未見大幅改變。到了年底12月，除5名之前參加過淡水地方會議的頭人外，另外只多了2名噶瑪蘭頭人前來領受公司的藤杖。卡隆於翌年春天派商務員Gabriël Happart前往北臺灣視察時，不忘交代應派Theodore與Lucas Kilas在一些幹練士兵的陪同下，得時常訪視噶瑪蘭地區，好讓該地人民習於東印度公司的存在，以贏得其友誼並歸順公司。<sup>36</sup>

到了翌年1646年5月，Theodore與喜左衛門等再度奉令前往噶瑪蘭處理貢稅催繳。但結果仍無所進展，帶回來的消息是只有前一年度的7社答應準備運送貢稅前來城寨；不過，淡水城寨首長Nolpé對對方答應納貢此事態度有所保留。<sup>37</sup>

我們這些北臺灣中間人雖然一一在噶瑪蘭貢稅催繳之事碰壁；不過，公司對哆囉滿金礦的野心，讓他們仍有發揮的餘地。也是同年5月，商務員Gabriël Happart奉命前往北臺灣，哆囉滿的金礦任務是此行的一項重點。Happart透過詢問Theodore、喜左衛門、Lucas Kilas等人，釐清了哆囉滿一帶的局勢後，派二名士兵在上述三人陪同下前往當地，並計劃將這二名士兵——即來自Leeuwarden的Jan Hendricxsen Ootman與但澤（Dantzig）的Daniël Sipter留駐當地，負責荷蘭人與當地的通訊。<sup>38</sup>

雖然荷蘭人的哆囉滿淘金夢到頭來終究仍然是南柯一夢，但東印度公司與哆囉滿社的關係穩固後，Theodore等人在哆囉滿的角色即逐漸淡出；另一方面，此時公司與哆囉滿間的往來，也不僅是由位北臺灣的淡水、雞籠駐地負責。位東臺灣卑南覓的駐地人員，加上其位舞鶴台地前進駐點的掃叭社，亦負責與哆囉滿當地的往來通訊。到了此一階段，

35 *DZII*, pp. 384, 394;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534, 536, 543 - 544, 554 - 555;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408、418。

36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58 - 60.

37 *Ibid.*, pp. 69 - 71.

38 *Ibid.*, pp. 71 - 76, 85 - 88, 102 - 104;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7年），上卷：概說・產業，頁207 - 221、234 - 235。

噶瑪蘭任務的成功與否，成為決定Theodore等人在東印度公司中的重要指標了；不過，對Theodore個人來說，他還替公司提供一項重要的服務，即首次大員行時與議長麥爾之間的煤礦生意協議。

## 陸、採煤事業

Theodore與議長麥爾在1644年協議出的採煤事業，同年夏天即開始動工。9月底，隊長彭恩結束蘭陽平原征戰任務返回雞籠城寨後，同行的二艘快艇——Breskens號與「鯀魚」（Harincq）號，即負有運煤到大員城堡的任務。<sup>39</sup>據載，只要駐地荷蘭部隊協助他們入山採煤，Kimauri社人對入山採煤之事信心滿滿。<sup>40</sup>不過，事隔年餘，到了1646年初，淡水駐地首長Nolpé派員攜帶100里爾前往雞籠向Theodore收購煤礦時，結局有點出入。100里爾理應可購得500桶煤，以協議中每桶364磅計算，共約182,000磅；不過，Kimauri社人開採的是沿岸淺層煤礦，冬季雞籠的東北季風讓開採工作相當不順，沖上懸崖的大浪讓工作人員處於險境，且挖出的煤礦大部分時間為海水沖失。因此，公司駐地人員只好答應延期補滿預定的交易量。為了完成應交付的煤，Theodore向公司要求重錘、楔子與尖鋤等工具，荷蘭人方面也答應照辦。此時，原待在北臺灣的公司鐵匠已去世，這些工具只好交由公司的奴隸打造。至於已交付給公司的煤，係按約定每批5桶，每桶364磅；不過，當公司的雞籠駐地人員再次分別稱這5桶煤的重量時，結果發覺各桶重量有異，最多差到20至30磅。Theodore旗下的人則宣稱他們無法分辨其差異。<sup>41</sup>

到了4月，Theodore與其族人開採的煤礦已達到約定的產量，甚至超過預期。據淡水駐地首長Nolpé的說法：雞籠方面的煤產可在近期達到1,000桶（balijs），淡水當局也已備好現款向雞籠方面收購500桶

39 DZII, p. 345；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363 - 364。

40 見卡隆給總督范迪門的書信，1644年10月25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485, 489；甘為霖的譯本省略此段。見William M. Campbell, op. cit., pp. 203 - 205.

41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49, 51.



煤；另外，北臺灣公司駐地人員另有庫存180桶煤。<sup>42</sup>1,000桶煤按約定即200里爾，加上先前購入的庫存180桶，即36里爾，合計共236里爾。

翌年1647年3月記錄提到：東印度公司委託Kimauri社人開採150單位（lasten）的煤；<sup>43</sup>同年5月，運集的煤約有216桶。依此時的計價已從協議時的每桶364磅降為326磅、每5桶1里爾計算，約值43.2里爾。不過，顯然地表淺層煤礦的開採已達限度，大雞籠人對日益困難的採煤工作漸有微辭，宣稱無法在原訂5桶1里爾、單桶重量為326磅的價錢下，持續為公司服務。<sup>44</sup>

在這議價過程中，Kimauri社人暫時占了上風。淡水駐地首長Nolpé給大員方面的書信中，即請求上級長官調高收購價格，理由是當初議長麥爾任上所協議出的價格，係有一但書：若對方之後因利潤不夠而不願意以此價格採煤，公司將會配合其要求調整價格。此時Kimauri社人已存妥450至500桶（balijs）的煤礦，待價而沽；Nolpé請求以公司名義收購，這樣一來，加上前一年度北臺灣駐地人員已收購的95桶（balijs），可為最近的船運先湊足276單位（lasten）。<sup>45</sup>不過，當時任職臺灣長官的歐沃瓦特，對公司駐地人員與Kimauri社人之間的煤礦交易價格，荷方採購價持續上揭一事，相當不以為然。

42 *DZII*, p. 493;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69, 71;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530。

43 *DZII*, p. 545;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602。*Last (en)* 為船隻載貨空間轉換成的重量值，早期Charlie R. Boxer引F. C. Lane於*Economic History Review*的說法，視1 *last*約等於120立方呎或2噸重，1噸約1,976公斤或4,000（荷蘭）磅。見Charlie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5), pp. 341 - 342。近日的研究則有不同的看法，以海牙出版的《東印度公司詞彙》（*VOC-Glossarium*）為例，一般視1 *last*約為3,000磅，即1,500公斤左右。參考Marc Kooijmans, *VOC-Glossarium*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 67;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 572; 不過，若換成測量米穀的單位時，等同東印度群島當地的重量單位*kojang*，1 *last*僅約有1,200 - 1,250公斤。參考Marc Kooijmans, op. cit., p. 67; 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91;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2007），頁484。

44 *DZII*, p. 572;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180 - 182;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637。中譯本將216（*Tweehondert en sesthien*）誤植為260。

45 *Ibid.*



## 柒、會歪哥的工頭？

歐沃瓦特原則上同意：當初Theodore與議長麥爾間所協議的價格，僅為短時間而訂，有著調整的空間；但是，他將整個問題焦點轉到Theodore本人身上，認為Theodore對待召來的勞工不公：Theodore原本打算付給工作人員的酬勞並不多，且甚至不是現金，而是破布、小塊布與破片，自己則吞走大部分的錢。歐沃瓦特提到：這是Kimauri社人為何有時不願替公司採煤的另一理由；但是在荷方向對方承諾其工資，並確實發給他們後，Kimauri社人即有開採的意願。歐沃瓦特甚至進一步懷疑這其中可能有些暗盤。他舉出Theodore不老實且貪財的前例：1644年9月隊長彭恩出征噶瑪蘭時，隨行的Theodore竟趁此機會設法從當地土著那巧奪大筆錢財。歐沃瓦特以一句當時的流行話形容：「自己剪下羊毛，而將豬毛留給公司（..., *latende zoo voor de Compagnie de verckens als men seyt, en hij selfs de schapen scherende*）」；代表Theodore所作所為是：「好康的攏予買去，歹康的才留予咱（*hó-khang-ê long hōo bāu-khì, pháin-khang-e chiah lâu hōo lán*）！」我們這位大員高官，甚至認為Theodore在噶瑪蘭地區不受尊重，並要求每當公司得收取任何東西時，得有1名公司方面認為可靠的荷蘭人在場，以免東西遭受侵占。也唯有如此，公司方面才得以了解噶瑪蘭人，並有辦法在適當的時候與對方締結友好。<sup>46</sup>

歐沃瓦特會將採煤之事與噶瑪蘭議題一併討論，係牽涉當時蘭陽平原的局勢；先前提及的噶瑪蘭人向公司納貢乙事，一直沒有進展。同年（1647年）春天，北臺灣駐地人員委託Theodore與2名三貂頭人前往蘭陽平原警告噶瑪蘭各社後，發現許多村社拒絕聽命於Theodore他們；在本來即與公司關係不佳的掃笏（Sagol-Sagol）社，Theodore與通譯除了遭對方污辱、禁止入社外，還為對方放箭多達5次，所幸沒傷到任何人；在武暖（Baboeloan）社那也遭到同樣的狀況。淡水駐地首長Nolpé

46 見歐沃瓦特給Nolpé的書信，1647年6月4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191 - 192.

悲觀地認為：失序與混亂正在噶瑪蘭當地蔓延，預估今年幾乎無法從該區收到任何貢稅。<sup>47</sup>不過，Nolpé在歐沃瓦特指控Theodore的立場上，雖然對Theodore逾權歪哥之事表示同意，也提及隊長彭恩在場期間曾斥責過Theodore；但是對Theodore在當地的地位，則看法不同：認為公司駐地人員從未自旁人接獲對Theodore的投訴，其本人所作所為也無害，因此「無法判定他是否受其人民尊敬。」<sup>48</sup>

但是，翌年1648年4月，Theodore與其他Kimauri社人前去噶瑪蘭交易時，某一晚在海灘附近存放交易物的小屋睡覺時，為噶瑪蘭人所突襲，當場Kimauri社人2名遇害，9人重傷，所有的物品被奪走。Kimauri社人無法說出攻擊者來自哪一社，因為附近的噶瑪蘭村社土著不是禁聲不語，就是佯裝對於此事一無所知。新任淡水駐地首長下席商務員Anthonij Plockhoy認為這「恐怕是也不過是爾爾的Kimauri社人所帶給自己的瘟疫」（*Doch het is te beduchten dat de Quimauriers bijna de beste niet en zijn en sulcke plagen selfs over den hals halen*），即有可能是Kimauri社人咎由自取；因為Tappari的Lucas Kilas以及其他馬賽人通譯曾說過：Kimauri社人從噶瑪蘭人那獲取物品的方式有時相當粗魯（*als vrij wat stoudt zijn*），寧可使用武力而不是友誼。<sup>49</sup>

無論對Theodore的評價是什麼，東印度公司在北臺灣的駐地人員還是得依靠他，甚至在大員的東印度公司高層也不得不默認此事。1650年年初，荷蘭人在無法逮獲於前一年殺害抵百葉（Kipatouwaya）社長老的噶瑪蘭兇手下，臺灣長官Nicolaes Verburch告訴淡水駐地首長Plockhoy，可雇用Theodore與Lucas Kilas協助辦案，因為「他們兩人是狡猾的人」（*als wesende twee geslepe ende doortrapte gasten*）。Verburch還特准Plockhoy：若對方一旦達成任務，可獲一筆不錯的獎金。<sup>50</sup>

47 DZII, pp. 572, 585；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637、660。見Nolpé給歐沃瓦特的書信，1647年5月11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181 - 183.

48 見Nolpé給歐沃瓦特的書信，1647年7月11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194 - 195, 197.

49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229 - 230.

50 Ibid., pp. 272 - 273.

## 捌、公司在噶瑪蘭的商務代表

隔年1651年年初，淡水駐地首長換成下席商務員Simon Keerde-koe，他認為老是不出席地方會議的噶瑪蘭人，是群只想擁有手持公司藤杖的光榮，而不願對公司表示敬意的人，根本是群完全不值得信任的背信之徒。公司若想從這地區獲取鹿皮，與其得像先前私人商販一般費心在當地投資，不如乾脆讓Kimauri社人替公司收購噶瑪蘭當地的鹿皮。Keerdecoe說到做到，為了購得水鹿皮，除了先依大員方面指示將150里爾交給頭人Theodore與Loupo，另外還將147大里爾交給Tappari社的馬賽人，並計劃再給Kimauri社人更多的金額好進行類似的事。<sup>51</sup>旋即不久，Keerdecoe以噶瑪蘭當地的市場需求量將會很大為理由，又給了Theodore與Loupo 400里爾、及40匹棉布，好用來收購噶瑪蘭當地的水鹿皮。換言之，公司交給Theodore與Loupo總額550里爾與40匹棉布，Tappari社人147里爾，光是現金即總值697里爾。<sup>52</sup>

Theodore與Loupo相當懂得趁勝追擊，進一步向Keerdecoe要求贊助，用的是Kimauri社一些基督徒及其親屬的苦境為理由；提到西班牙人在北臺灣時，教會會負責照料所有貧困的教徒。西班牙人離去後，Kimauri社人雖失去援助，但仍持續照料對方。現在他們在荷蘭人的統治下，也已轉至荷蘭人的基督信仰，希望公司不要離棄他們，因為西班牙人也從未這麼做。掌旗官Jacob Baers也為之聲援，宣稱：假如其人手與其他一些善人沒有出於基督之愛，多花時間供應這些人衣食，對方早已死於飢餓與寒冷。Keerdecoe雖以Kimauri社人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前來向公司購買穀物，推想他們仍儲有稻米；不過，他認定Kimauri族人雖聲稱擁有基督教之名，按理彼此應提供仁愛與基督情誼，但有些教徒卻背道而馳。因此，Keerdecoe決定從當下起提供20名窮人500磅的稻米，此一支出約等於12名半的公司士兵配給量，並請求臺灣長官Nicolas Verburch

51 Ibid., pp. 350 - 351, 353.

52 Ibid., pp. 356, 359.

允許此佈施計劃能按月持續施行下去。<sup>53</sup>

Verburch答應Theodore與Loupo提出的佈施要求，但對Keerdecoe在委託Theodore等人至噶瑪蘭當地收購鹿皮時，採預借現金的做法之事，相當不以為然。Verburch以公司並不習於以此方式做生意，相反的，而是收到對方繳交的鹿皮後才把公司的織物與現金交給對方為理由，認為讓對方習於預先獲得金錢，會讓公司產生呆帳，因為提供大量金錢會有破產的風險。<sup>54</sup>Verburch的顧慮並非空穴來風。早在1646年年初，前述的Lucas Kilas即因負債於東印度公司，而得繳出總額為153兩（*tael*）4錢（*maes*）8分（*condrijn*）的純銀，或總額544：17：1基爾德（*guilders*）。<sup>55</sup>Lucas Kilas積欠債務的確實原因不詳，但應不脫為先前向公司賒債預購物品。

碰巧也在1651年年初，Lucas Kilas也因薪資問題與公司關係鬧僵。早在1648年，淡水駐地首長Plockhoy即比照公司付給喜左衛門一樣的待遇，即一個月12基爾德，另加上2里爾的生活津貼，作為Lucas Kilas替公司服務的俸酬。<sup>56</sup>之後，因Lucas Kilas向長官Verburch要求加薪與增加生活津貼被拒，不想再受雇於公司，辭職獲准。公司因而免去他的Tappari頭人職，並取回象徵公司權威的藤杖。其職位改由Gravello接任，Lucas Kilas原本的薪水也轉給Gravello。<sup>57</sup>雖然大體而言，Gravello相當配合北臺灣駐地人員的要求；不過，他本人與喜左衛門一樣，係屬上了年紀的長者，喜左衛門當年應已近古稀之年。因此，能勤跑噶瑪蘭的，

53 見Keerdecoe給長官Nicolas Verburch的書信，1651年3月15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355, 358.

54 見長官Nicolas Verburch給Keerdecoe的書信，1651年4月7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364 - 366.

55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50, 51. *condrijn*為日本貨幣單位，100分等於10錢或1兩，1里爾為73分；故153兩4錢8分約為210里爾。1基爾德約為20 *stuivers*，1里爾可分別等同48、52、56或60 *stuivers*，其差異取決於係一般的里爾（56 *stuivers*）或西班牙里爾（52 *stuivers*），或1656年前（48 *stuivers*）後（60 *stuivers*）之別，甚至兌換地點等因素。參考Marc Kooijmans, *VOC-Glossarium*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 34; *DZII*, p. 620;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571 - 572; 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p. 292; 歐陽泰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485。544：17：1基爾德約為10,880 *stuivers*，若亦值210里爾，則此時1里爾約為52 *stuivers*的兌換率。

56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228 - 230.

57 *Ibid*, pp. 357, 360.

就只有正值34、5歲壯年的Theodore了。<sup>58</sup>

不過，成為東印度公司在噶瑪蘭地區商務代表的Theodore與其Kimauri族人，同年夏天即又在噶瑪蘭當地惹出一場命案。

### 玖、Jan Pleumen之死

1651年夏，淡水駐地首長Keerdekoe為了處理為時已久的噶瑪蘭地區內部村社間，不服公司者對歸順公司者的挑釁與騷擾，趁北臺灣馬賽人循往例經由海路前往噶瑪蘭交易之時，下令Theodore小心翼翼地記錄擁有公司藤杖的歸順村社名單，並委派在Kimauri的通譯Jan Pleumen與該處駐地士兵一名一同前去處理必要的紀錄，要求他們找出哪個頭人是主要的惡棍，並記下其名字，讓公司在需要時可便於行事。<sup>59</sup>

Theodore與Jan Pleumen等人的噶瑪蘭之行，結局是擦槍走火，賠上了Jan Pleumen一條命。起因是在辛仔罕（Sinagangh）社時，一名Kimauri社人在代表公司的馬賽人處酒醉，與2名噶瑪蘭人打架起爭執，造成一陣騷動，圍觀人群愈聚愈多且喧鬧聲不斷。通譯Jan Pleumen聽到爭吵後，馬上與士兵Roelof Claerschieve帶著火槍，連同Theodore走過去，打算平息此事，但是沒什麼效果，局勢反而有點失控。Jan Pleumen只好退回公司的小船處，Roelof Claerschieve則與Theodore前往其臨時住處。但是，二人一抵住處後，即發現三、四百人出現在房子前，舉著斧頭、箭已上弦，在那大聲叫囂。對方其中一人喊說抓住荷蘭人與Theodore並殺死他們。也正在這期間，Jan Pleumen朝著喧鬧之處回來，順手以火槍開火示警，但是看見發生在Theodore房子前的這一切後，因為知道接著會發生什麼事，馬上在易於防禦之處豎好槍枝。對方看到他後，其中數人立即帶著武器走向他，Jan Pleumen以備妥的火槍瞄準對方，正中其中

58 喜左衛門依1643年的文獻資料記載為62歲。DZII, p. 54；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50。故1651年時已達70。Theodore依1644年文獻記載為27歲。DZII, p. 257；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271。故1651年時應正值34、5歲的壯年。

59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373, 377.



一人，此人倒地死亡，另一人則手臂重傷。接著對方來了一名土著，舉起斧頭把Jan Pleumen砍成數塊，先是其下半身，然後是手臂，之後砍下首級。命案發生後，對方匆忙撤回Theodore的房子處，宣稱也要像砍殺Jan Pleumen般砍殺Roelof Claerchieve，Theodore若不從也將一併對付；但幸虧Theodore與稽查Barnabe已將Roelof Claerschieve藏起來，對方因而無法得逞。肇事者乃決定掠劫在場所有Kimauri社人的錢財與貨物，讓他們一絲不掛，無一例外。結果不僅是在場無關重要的人，甚至Theodore本人的衣物也遭到洗劫一空，包括長官Verburch於去年送給他的帽子也難逃此劫。至於公司方面，也因此損失550大里爾與65塊棉布；這筆錢與貨物係準備用來交易水鹿皮，由頭人Theodore負責照料。事後，Theodore本人與其族人則到雞籠城寨投訴。事件調查後，係辛仔罕社的頭人Tarwee（Tarribe）涉嫌重大；Tarwee是繼Siabamgoricknou後、自1648年起擔任「歸順的」辛仔罕社的頭人，本人獲頒公司鑲銀藤杖，成為由6個不同聚落所組成的辛仔罕頭人。<sup>60</sup>

東印度公司對此案的處理態度並不太一致。淡水駐地首長Keerde-koe認為：為了追捕這些辛仔罕社叛徒，公司應該即刻以唐船載運200名以上的精兵登陸噶瑪蘭，並加以大肆破壞辛仔罕社來毀滅對方。完成後，部隊指揮官應在他離開之前，在馬賽人的小島建立城寨，該小島位一條淡水河旁，終年派人駐紮以持續巡邏（當然已事先提供肉與米等補給）。Keerde-koe還補充來自Theodore與稽查Barnabe的說法：假如公司派出200餘名的部隊追捕Tarwee與其同夥時，哆囉滿人與其他村社都會阻止對方，不讓他們進入山區。至於因酒醉毆打噶瑪蘭人而造成Jan Pleumen遇害的Kimauri社人則先被監禁，等待大員方面進一步的指示。<sup>61</sup>不過，長官Verburch雖也認同血債血還，但以大員方面目前沒有能力出兵，以及部隊非常難以接近噶瑪蘭地區為由，要求Keerde-koe效

60 DZIII, p. 229; W. Ph. Coolhaas, op. cit., p. 539; Chen Shaogang, op. cit., p. 288;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383 - 385, 389 - 390;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年），頁234；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337。

61 見Keerde-koe給長官Nicolas Verburch的書信，1651年7月19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385 - 386, 390 - 391.



法公司在南路與東部的做法一樣，即透過盟社攻擊對方。每獵一顆叛亂者人頭，即可得5匹棉布的賞金。<sup>62</sup>至於東印度總督Carel Reniersz，亦持一樣的看法，認為眼前只適合鼓勵盟社對付辛仔罕社，但每顆男性首級僅賞以3匹棉布。<sup>63</sup>

不過，Tarwee與辛仔罕社之事並沒有如任何公司官員的預期進行。荷蘭人的盟社並未發揮任何效用，根據Kerdekoe事後的說法：噶瑪蘭人比我方友人更為強大，我方友人無法在缺乏荷蘭軍隊的協助下對抗如此強大的敵人。他們也害怕若帶著敵意行動，遲早會被噶瑪蘭人襲擊並化為焦土。看來，Theodore等族人在說服不了公司派大軍助陣的前提下，與其孤立無援地當荷蘭人的馬前足，不如重拾本行當生意人，繼續至噶瑪蘭從事交易；因此，長官Verburch到了隔年（1652年）10月，在鑑於噶瑪蘭人已比先前歸順多了的前提下，心中雖對整件事半信半疑，仍不得不對通譯Jan Pleumen之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向總督Reniersz表示：「激恬恬（kek-tiām-tiām）」與「假毋知（ké-m̄-chai）」將是維持和平的最佳且權宜之策。<sup>64</sup>新任總督Joan Maetsuijcker亦表贊成此策略。<sup>65</sup>

之後，又過了二年，到了1654年夏天，全臺灣遭到異常的乾旱，北臺灣據說因為熾熱的太陽而變得荒蕪且焦熱，幾乎無任何引水可用；蘭陽平原亦不例外。此時，當派駐淡水的商務員Thomas van Iperen在獲知噶瑪蘭地區有些村社已有百人亡故時，方自我安慰地表示：「我們察覺到神聖上帝的手無所不在（*In somma, overall hooren wij van de hand*

62 見長官Nicolas Verburch給Keerdekoe的書信，1651年9月9日，以及長官Nicolaes Verburch給總督Carel Reniersz的書信，1651年10月25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407 - 409, 422, 424. 甘為霖的譯本則省略此段。見William M. Campbell, op. cit., pp. 274 - 276.

63 見總督Carel Reniersz給長官Nicolas Verburch與臺灣議會的書信，1652年5月21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431 - 434.

64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441, 450. 原文為 *stilswijgen* 與 *simuleeren*，前者為「靜默」之意，後者直譯為「佯裝」，但在牽涉（軍事、武力）衝突的情境時亦有 *malingering* 之意（裝病或借故不執行應盡的職責）。故整個情境可譯為「保持沈默」與「假裝不知道」，即「激恬恬（kek-tiām-tiām）」與「假毋知（ké-m̄-chai）」。

65 Ibid., pp. 462, 465.

*des devijnen Gods*)。』<sup>66</sup>到了1656年夏，長官凱撒在得知有3名噶瑪蘭長老因害怕公司報復而不敢前往雞籠城寨時，下令在淡水的下席商務員Pieter van Mildert不要追究此事，以免「事情一開始就像車輪輪幅有根橫木卡住般麻煩 (*in't begonnen werck wel een spaeck in't wiel mochte raacken*)」。』<sup>67</sup>看樣子，Jan Pleumen幾乎是白白死於Theodore的Kimaury族人與噶瑪蘭人之間把酒言歡後的擦槍走火。

### 拾、討價還價

至於Theodore以及其Kimaury族人在Jan Pleumen事件中損失的私人與公司財產，一說有取回，一說沒有；總而言之，眾說紛紜，十足的「十嘴九尻川 (*chap chhùi káu kha-chhng*)」。公司的北臺灣駐地人員也是一頭霧水，Keerdecoe用「比起從搭蓋巴別塔的人那裡去理解事情好不到哪去 (*niet anders uyt te comprehenderen als off men eens van de ambachtslytten van de Toorn Babel wilden lesen*)」來形容。<sup>68</sup>公司的損失應該是荷蘭人自己認了，至於Theodore等人的損失事後如何解決，東印度公司可就不知情了；但是事後Theodore等人還是繼續其習以為常的噶瑪蘭貿易，畢竟Kimaury人與噶瑪蘭人交易時產生意外事故，這也不是第一次。

至於Theodore的其他事業，並未因Jan Pleumen事件受到多大影響。1655年，公司一方面因自蘇格蘭運至荷蘭本國的煤礦減少，東印度方面無法自荷蘭獲得以往需求的量，公司在爪哇、印度半島東南部的科羅曼德爾 (Coromandel) 等駐地都欠缺足夠的煤，對雞籠的煤產依賴加

66 Ibid., pp. 524 - 525.

67 見長官凱撒給下席商務員Pieter van Mildert的書信，1656年8月29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V: 1655-1668* (Taipei: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10), pp. 201, 204 - 205.

68 見Keerdecoe給長官Nicolas Verburch的書信，1651年8月25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396 - 399.

重；<sup>69</sup>另一方面，大員方面察覺前一年度自雞籠運來的煤品質變差，量少且含砂量增加，除了用來鋪路外對鐵匠幾乎一無事處，乃要求北臺灣駐地人員控管好品質。<sup>70</sup>我們的煤礦工頭Theodore與另一Kimauri社長老Granvello，告訴大員長官沿海煤礦已採盡，在入山開採有困難的前提下，公司原定的9桶收購價，只能提供8桶。臺灣長官凱撒（Cornelis Caesar）在缺煤的壓力下，答應了Theodore等的要求。公司並答應想辦法在3個月後湊足200支鐵楔（isere wiggen）、150支槓槌（moocker）與150支鐵鎬（isere houwelen）給Kimauri社人，好開挖覆蓋在岩層下的煤礦。<sup>71</sup>

作為一名中介的工頭，Theodore代表其族人涉入的東印度公司產業不止是煤礦開採。1654年，東印度公司計劃在劍潭山（Marenatsberg）砍伐林木，作為建築木料。翌年4月，臺灣長官凱撒與Theodore決定4至5噶（vademen）<sup>72</sup>上好樟木幹（camphurhoute blacken）的收購價：5噶為10大里爾，4噶則為8大里爾；大員方面並要Pedel隊長關照此事。5月，公司進一步了解淡水河沿岸的林木產地後，Pedel計劃以每人每日8 *stuivers*的價格，雇用Kimauri與三貂社人從事伐木。<sup>73</sup>

8 *stuivers*的日薪，在當時應是合理的薪資。東印度公司雇用從事築堡的唐人苦力，日薪為6 *stuivers*，但其中的9.7%得以人頭稅名義繳給公司。雇用的歐洲士兵，日薪換算後約為7 *stuivers*，但在臺期間只能支領一半，另一半則載於帳簿，俟回國後發給。<sup>74</sup>不過，Theodore卻臨陣反悔。

同年（1655年）6月，淡水駐地商務員Pieter Elsevier發覺Theodore

69 見長官凱撒給商務員Pieter Elsevier的書信，1656年8月29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61, 64.

70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18 - 19, 21, 61, 64.

71 *DZIII*, p. 493, 509;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頁471, 486。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18 - 19, 21, 28, 31 - 32, 61, 64。《熱蘭遮城日誌》則將鐵鎬記載為撬棍（koevoeten），並省略數量。

72 1 *vadem*約為1 fathom（噶），1 fathom約為6 feet（英尺）。

73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43、183、192；康培德，〈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臺灣史研究》10.1（2003年），頁17 - 18。

74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2002年），頁69 - 70、143 - 145。

竟然「棖生（tè<sup>n</sup>-chhi<sup>n</sup>）」裝無辜，先說不知道此事，接著說公司若不提供米糧勢必無法進行。待公司唐船運來200袋米後，Theodore又改口說他從未答應此事，也不知道該如何進行，頂多是向公司駐地人員指出樟木林在哪。<sup>75</sup>長官凱撒知道此事後可火大了，痛罵說Theodore竟敢撒謊，信誓旦旦地說這可是Theodore等人在他本人與臺灣議會議員面前的承諾，說只要按先前西班牙人支付的工資即願為公司伐木。<sup>76</sup>

Theodore之所以會反悔並不難理解。當地人既然將劍潭山稱為marnats/marenas山，就是與marnas（禁忌）有關。早在1644年9月隊長彭恩率軍征伐噶瑪蘭時即遇到所謂的marnas，當時彭恩在蘭陽平原所向披靡，各社莫不派人來表示願意與荷蘭人「結盟」；不過，當彭恩要求歸順納貢時，當地人回說此時恰逢農作收穫時節，如播種時節一樣是marnas，人畜不可在各地走動，物品也不許在各地流動，以免帶來霉運。彭恩只好答應對方，待marnas結束後再帶著規定的貢品前往雞籠城寨。<sup>77</sup>其實早在1654年初，北臺灣公司駐地人員在探勘林木時，就已察覺當地人是以「迷信般的敬畏」態度面對劍潭山；<sup>78</sup>換句話說，就算Theodore本人願意，其族人恐怕願共襄盛舉者也屈指可數。當然，最後所謂的「上好樟木」也因事實上是木質不佳的茄冬樹等因素而作罷。<sup>79</sup>

## 拾壹、尾聲

我們的故事主角Theodore雖經歷了西班牙人的蒞臨與遠離，但僅眼見荷蘭人的到來而未有機會目睹「紅毛人」離去。據載，Theodore於1656年11月15日去世，享年39歲，正值人生的壯年，據說是遇害身亡

75 見商務員Pieter Elsevier給長官凱撒的書信，1655年6月30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72, 79 - 80.

76 見長官凱撒給商務員Pieter Elsevier的書信，1655年8月28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91 - 92, 98.

77 *DZII*, pp. 340, 342 - 344;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470 - 471, 474, 476;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359、361 - 362。

78 *DZII*, p. 300;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頁291。中譯略過此句。

79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43。

(*met vergift soude omgebracht zijn*)。<sup>80</sup>

Theodore臨終前一年的活動，也不改其先前的模式。1655年初，Theodore夥同Tappari的頭人Toebas Parragou以及4名Kimauri社人，以替淡水駐地商務員Thomas van Iperen送書信為由，要求「一同」前往大員謁見長官凱撒。<sup>81</sup>凱撒當然覺得送封無關緊要的例行書信如此大費周章有點離譜，在與Theodore及同行的Kimauri社長老Granvello商議好雞籠煤礦與淡水木材的交易後，Theodore本人除了不忘從大員長官那先領取應得的40里爾，還以62 stuivers換1里爾的高匯率預支200里爾，預支的金額承諾回到雞籠後將還給公司。<sup>82</sup>不過，到了10月，北臺灣駐地席商務員Pieter van Mildert仍只從Theodore那收回了100里爾。<sup>83</sup>

也在同一年，Theodore與Barnebe二人以Kimauri社頭人兼首長（cabessa's en opperhoofden）身分為Kimauri社人向長官凱撒投訴：噶瑪蘭的抵美福（Tomecho）社與珍仔滿力（Pinabarat）社的頭人們奪走Theodore、Barnebe以及其他Kimauri社人600里爾，因為Theodore等人不知如何取回其財產，乃要求公司迫使對方就範。凱撒不得不於5月底下令淡水駐地商務員Pieter Elsevier進行調查此一荷蘭人根本不知來龍去脈的事，若查明一切屬實的話，凱撒要求Elsevier得設法幫Theodore等人取回損失的財物。<sup>84</sup>

一直到他去世前，Theodore還是北臺灣公司駐地人員的好幫手。1655年11月，Theodore與Harmen Westhoff一同擔任淡水河、武勝灣河沿岸民眾控訴通譯Lucas Kilas、Tijmon Breda二人敲詐錢財等不當行為起訴案中的翻譯。<sup>85</sup>隔年1656年年初，北臺灣發生八里坌（Parragon）、

80 見商務員Egbert Codde給議長揆一（Frederick Coyett）的書信，1657年3月14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243, 245.

81 見商務員Thomas van Iperen給長官凱撒的書信，1655年2月9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2, 6.

82 見長官凱撒給商務員Thomas van Iperen的書信，1655年4月19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26, 29 - 30, 32.

83 見商務員Thomas van Iperen給長官凱撒的書信，1655年10月17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123, 132.

84 見商務員Pieter Elsevier給長官凱撒的書信，1655年5月10日、1655年8月28日；商務員Pieter Elsevier給長官凱撒的書信，1655年6月30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61 - 62, 64, 71, 79, 92, 99.

85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104 - 117.



南崁（Percoutsy）、和Mattatas等社民眾襲擊在海邊捕魚、撿蠔的漁民事件，Pillien、北投（Rappan）和圭柔（Chinaer）社的人也跟著起哄，打死了數名唐人。<sup>86</sup>不過，圭柔社頭人於2月底即透過向Theodore、長老Granvello Loemas以及稽查Thobas Bauw哭訴：自己係為部分社眾所脅迫才參與攻擊唐人。<sup>87</sup>

不過，Theodore去世後沒多久，公司方面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先是1657年年初，新任的北臺灣駐地首長下席商務員Egbert Codde注意到，淡水河沿岸的各社頭人循例前來見新任公司代表時，噶瑪蘭人也不例外，大多出席，除了抵美福（Tomegoch）、抵美簡（Patton-gadiuan）、以及珍仔滿力（Pinabarath）等三社未派代表。Codde於是詢問前來的其他噶瑪蘭代表，得到的答覆是：缺席的3社的確是公司的盟友，因害怕遭受傷害而缺席。Codde當然不得其解，但依稀記得Kimauri的馬賽人提起過這些河畔人（de Riviersgasten）是不可信的，不過Codde覺得目前一切無恙；只要公司讓對方雙手載滿禮物、肚子裝滿酒，這些所謂不可信的人其實都會按照與公司的約定而行。<sup>88</sup>

到了夏天，商務員彭實（Pieter Boons）上任北臺灣駐地首長職後，派助理Jacob Balbiaen去噶瑪蘭、哆囉滿實地走訪一趟。Balbiaen在噶瑪蘭遇見一名叫武歹（Boutay Sataur）的Tagadouang社人，他係數年前為公司任命為該社的頭人，並授予公司藤杖。但這位武歹想把藤杖交還Balbiaen，說其族人不想再與公司為友，特別是代表公司的Kimauri通譯Theodore來向他們索取繳交公司的貢稅物後，他即不想再領有公司藤杖擔任所謂的頭人，反正他本人哪也不去，只在自己村社活動，不理會外面的事。Balbiaen當然勸武歹不要衝動，繼續擔任公司頭人，且公司早已廢除貢稅，<sup>89</sup>他此行前來只是走訪當地的公司盟友，且公司在不久將會派兵前來討伐與公司為敵的人。武歹一聽即嘀咕道：其族人至少可抵

86 DZIV, pp.8 - 9；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四）》（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年），頁7；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148。

87 DZIV, p. 28；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四）》，頁31；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156 - 157, 166 - 167, 171.

88 見商務員Egbert Codde給議長揆一的書信，1657年3月14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242 - 243, 245.

89 東印度公司自1648年起即廢止向歸順的村社徵收貢稅年，算起來應該是將近9年前的事。



擋300名荷蘭士兵，一點都不怕。不過，Balbiaen還是款以煙酒後，才讓武歹回去。事後，荷蘭人方面聽說武歹他們只有30名的武力，且據認識他的Kimauri社馬賽人的說法，武歹是個只要一逮到機會即出去偷搶的傢伙。<sup>90</sup>

事到如今，整個圖像似乎有了不同的角度。到了10月，北臺灣駐地首長彭實向大員的臺灣議會議長揆一（Frederick Coyett）報告：這麼多年來，Theodore與Loupo等Kimauri的頭人，根本是假借公司名義在噶瑪蘭地區大飽私囊，他們私下自噶瑪蘭帶回稻米、獸皮、奴僕後，偷偷地藏村社，然後再去謁見公司駐地首長，誇口說為公司辦了多少事，遭遇多少困難後，再從公司那獲得補償。當噶瑪蘭人一來到雞籠，他們即帶對方前來謁見駐地首長，以榮耀首長之名讓公司盡招待之實。其實，這些Kimauri人既是公司駐地首長的通譯，也是噶瑪蘭人的通譯，對雙方所說的話都有所保留，只讓其中一方知道這些Kimauri人想讓對方知道的事。對噶瑪蘭人來說，公司只是透過這些Kimauri人的嘴而存在。彭實進一步從來訪的噶瑪蘭人那察覺，Kimauri人其實是用公司的名義從噶瑪蘭人那為自己購入大量的稻米與獸皮。換句話說，整個過程有如Kimauri人請客，東印度公司買單。漸漸地，噶瑪蘭人也發覺拿獸皮直接與駐地荷蘭人交易比與打著公司名號的Kimauri人買賣划算得多。透過Balbiaen的實地走訪所獲的資訊，彭實建議直接在離海岸半小時路程的哆囉美遠（Talabiawan）社成立由荷蘭人經營的驛站（logie）。至於哆囉滿人，彭實亦持相同的看法，認為其實是Kimauri人從中作梗。總而言之，所謂「狡猾的Kimauri馬賽人係藉由抹黑讓我們懷疑對方，認為荷蘭人在那一定會被打死，此一策略係讓我們與噶瑪蘭、哆囉滿間保持距離，Kimauri人才有機會以公司的名義居中獲利。」<sup>91</sup>

彭實沒多久即得了所謂的「淡水（風土）病（Tamsuyse ziekte）」，於任上去世。事後，大員方面於1658年派商務員Nicolaas Loenius接任其

90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281, 296. Tagadouang在1640年代後半噶瑪蘭地區的村社人口、戶數調查中又記為Tedoggedan/Tatoggedaen，當時是個擁有30餘戶、150餘人的村社。

91 見商務員彭實（Pieter Boons）給議長揆一的書信，1657年10月28日。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349 - 354, 359 - 364.

北臺灣的首長職。同一時期，助理Jacob Balbiaan和Harman Broeckman奉命帶兩名士兵前往哆囉滿嘗試直接交易黃金；另外，助理Van der Meulen則獲派前去哆囉美遠（Tallabayawan）從事鹿皮交易。<sup>92</sup>Theodore身前所謂「公司在噶瑪蘭的商務代表」此時代，正式劃下句點。對公司北臺灣駐地人員而言，Theodore或許就如同其於文獻中偶會出現的全名——Theodore Hermano中的Hermano：如軍中同袍一般的手足兄弟；其中介、通譯、頭人等角色，有如公司在北臺灣不可或缺的伙伴般。但對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說，Theodore的另一面恍如揮之不去的夢魘：「歪哥（oai-kô）」當然是免不了，本人及其族人與噶瑪蘭人間的私下糾葛，讓公司捲入此一紛爭，還賠上人命，或許還真的「帶衰（tài-soe）」。

## 拾貳、歷史的機緣：為什麼是雞籠一帶的Kimauri人？

Tappari人與Kimauri人都是位北臺灣海岸一帶的馬賽人，17世紀初的分布範圍約在淡水河口至基隆港灣一帶。兩者雖習俗相同，但彼此涇渭分明，不過不至於到互不通婚；彼此間存在的勝過對方的企圖，但又不至於到互為仇敵。二者聚落都是散村的形態，並未形成二個集村，一般多以Tappari在西，Kimauri在東。兩群人的關係，類似同語族但分屬不同的地域，彼此的核心親屬群亦可能有所別。另一方面，1632年西班牙神父Jacinto Esquivel的記錄，算是最早提及Tappari與Kimauri二者之別的資料，記錄提及Tappari與Kimauri係同宗，且Kimauri人都是Tappari人。<sup>93</sup>換句話說，此時Tappari人是包含Kimauri人的。

92 *DZIV*, p. 311; W. Ph. Coolhaas, *Generale Missiven: van Gouverneurs-generaal en raden aan Heren XVII der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deel I II, 1655-1674*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68), p. 238; Chen Shaogang, op. cit., p. 458;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四）》，頁372；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08；中村孝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頁242。

93 José Eugenio Borao, Pol Heyns, Carlos Gómez and Anna Maria Zanduetta Nisce,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Taipei: SMC, 2001), p. 166;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79；陳宗仁，〈西班牙佔臺前期的臺灣知識與經營困境：依據1632年傳教士Esquivel報告的分析〉，「臺灣涉外關係學術研討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2010年9月17-18日。

1642年，待荷蘭東印度公司接手北臺灣時，Sisinjan是Tappari與Kimauri兩群共通的頭人。荷蘭人扶植通譯Theodore為頭人時，一開始也是計劃讓他成為兩地的頭人，只是事與願違，當時年僅25、6的Theodore只能作為其Kimauri族人與荷蘭人間的中介，無法代表Kimauri以外的Tappari人（若此時Tappari人仍包含Kimauri人的話）。此即Lucas Kilas之所以能出來代表Tappari人（不含Kimauri）與荷蘭人間的中介之故。

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中，Kimauri人與Tappari人更明確係分指兩群人，彼此間的隸屬關係已不復再，但與三貂社人一同稱之為馬賽人。不過，在公司的村社人口、戶數調查資料中，可看出荷蘭人以語言、地緣分類馬賽人時的兩難：1640年代時，Tappari係與淡水河流域沿岸的村社一同登錄，Kimauri與三貂雖載明為馬賽人，卻與噶瑪蘭村社同一欄；1650年的分類則將Tappari、Kimauri與三貂獨立為馬賽人一欄，與淡水河流域或噶瑪蘭都無關；但1654年以後又將Tappari併回淡水河流域沿岸的村社欄，馬賽人一欄僅剩Kimauri與三貂。此一分類上的變化，除了有語言、地緣上的思考，當然也反映某一特定年代北臺灣的公司駐地人員如何思考轄境內村社、人群彼此間的關係。但不論如何，Tappari、Kimauri已是兩群互不隸屬的群體，且從荷蘭時代已知的1640年代中葉至1650年代中葉的村社人口、戶數資料來看，Kimauri人數、戶數均為所有馬賽人之冠。

表一 馬賽人的戶口調查資料分類與人口、戶數表

|         | 1646年9月         | 1647年5月             | 1648年5月               | 1650年5月          | 1654年3-4月     | 1655年3月     |
|---------|-----------------|---------------------|-----------------------|------------------|---------------|-------------|
| ...     | 淡水河與武勝灣河沿岸的淡水村社 |                     | 淡水村社：淡水河沿岸            | 淡水村社：...         | 與公司結盟的淡水河沿岸村社 |             |
| Tappari |                 |                     |                       |                  |               |             |
| Kimauri |                 | 雞籠嶼至整個噶瑪蘭灣的北方村社：馬賽人 | Kimauri、三個噶瑪蘭灣的村社：馬賽人 | Kimauri至三貂：馬賽人村社 | 馬賽人村社         |             |
| 三貂      |                 |                     |                       |                  |               |             |
| ...     |                 |                     |                       | 噶瑪蘭灣             | 與公司結盟的噶瑪蘭村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Tappari | 278<br>/84      | 288<br>/84          | 280<br>/84            | 325<br>/87       | 250<br>/72    | 157<br>/48  |
| Kimauri |                 | 408<br>/117         | 500<br>/120           | 541<br>/130      | 506<br>/134   | 491<br>/130 |
| 三貂      |                 | 311<br>/90          | 360<br>/86            | 375<br>/86       | 360<br>/92    | —<br>—      |

說明：1、1646年9月的資料由公司士兵與Lucas Kilas起草，僅包含淡水河與武勝灣河沿岸的淡水村社。

2、欄位中刪節號「...」表示原文尚有其他文字記載，但與本文無關而刪除；如左方第一欄中的刪節號表示原文項下還有其他村社，但因與本文討論無關而刪除。

3、人口、戶數值的表示，數值前方有「/」符號者表戶數，如 /84表示84戶；前方無符號者表人口數，如278表示278人。

資料出處：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123-124, 187-188, 235-236, 293-294, 501-502;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12-15;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年），下卷：社會·文化，頁22、27。

雞籠一帶Kimauri的崛起，明顯係為西班牙人、荷蘭人曾先後將雞籠視為北臺灣的行政重心影響所致。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16年間，雞籠為其首要的駐地，在臺歷任最高行政首長皆以和平島上的雞籠城寨為

駐地。<sup>94</sup>荷蘭人於1642年攻克北臺灣後，Johannes Lamotius、Hendrick Harroussé等高階軍職人員駐防期間，雞籠係東印度公司主要的北臺灣駐點，淡水方面僅由中尉職的Thomas Pedel負責。之後，約在1644年左右，隨著Harroussé等高階軍職人員離去，大員方面開始派任商務職的公司雇員至淡水擔任駐地首長，雞籠方面僅由掌旗官Hendrick Jacob Baers負責，加上之後北臺灣的地方會議係以淡水為主場，淡水的重要性即逐漸超越雞籠，成為北臺灣的公司駐地重心。

當西班牙人與荷蘭人相繼於雞籠設置北臺灣的據點時，雞籠一帶的Kimauri人乃為其所依賴的中介者或代理人，負責處理雞籠以東、以及繞行東北角至蘭陽平原的地方事務，此措施明顯有助於提升Kimauri人在（或對比於）Tappari人、甚至在馬賽人中的重要性。<sup>95</sup>

若我們再拉大時間與空間的尺度，北臺灣的崛起，係16世紀的事。約略在1570年以後，北臺灣的淡水、雞籠兩地已成為唐人與日人間的一處重要交易地。<sup>96</sup>而淡水（洋）、雞籠（山）名稱的由來，則是航行於福建、琉球間海員的庶民用語，前者與取水、後者與航向指標有關。淡水、雞籠此二稱呼，約略在16世紀中葉左右，逐漸取代出自文獻用語、但不盡然獨指北臺灣的小琉球一詞，成為代表北臺灣的地名。<sup>97</sup>

至於當時在臺灣活動的唐人，約在17世紀初，亦有「大幫坑」、「沙巴里」等地名來代表北臺灣。大幫坑即八里坌一帶，沙巴里則指淡水一帶。<sup>98</sup>考慮當時在臺活動的唐人多循水路，則可進一步推論二者係

94 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臺灣〉，收於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年），頁30；José Eugenio Borao, *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1626-1642: The Baroque of a Renaissance Endeavo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03 - 134；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著，Nakao Eki譯，《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1626 - 1644年）：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北：南天，2008年），頁171 - 230。

95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79。

96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收於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頁46 - 48；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頁130 - 166。

97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頁63 - 76。

98 陳第，〈東番記〉，《流求與雞籠山》，文叢196（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頁89；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79；〈蕃薯圖像的形成：十六、十七世紀臺灣地圖的研究〉，「空間新思維——歷史與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2008年11月7 - 8日。



以淡水河口為界，前者指河口以西，後者為河口以東。若以讀音接近將沙巴里視為Tappari，在早期地名用語並無明確邊界、且會隨時代調整地理範圍的前提下，沙巴里所指的範圍，循著Tappari人的分佈範圍，從淡水河口向東繞過富貴角至基隆港灣，並非不無可能。這也與1632年記錄中的Kimauri人都是Tappari人此說法相符，即17世紀初北海岸一帶係以沙巴里（Tappari）的概念為主。至於Kimauri，係西班牙人來到雞籠後，方逐漸從Tappari中突顯出來，到了荷蘭時代即與Tappari等同。<sup>99</sup>

我們的主角Theodore，即是在此一歷史機緣中趁勢崛起，在他9歲或10歲左右，西班牙人蒞臨北臺灣，於雞籠設立據點。Theodore於成長過程接受基督教，之後又成為歐亞異文化間的中介，荷蘭人來後又因緣際會地由通譯轉為頭人。不過，也因他本人的限制，只能代表Kimauri，但卻也進一步突顯出Kimauri的位置與重要性。

### 拾參、小結

海洋會隔離外界，也能連接外界，其功能與交通要件、世界潮流等習習相關。臺灣島史的概念之一，即在思考不同的時代隨著周邊國際情勢的變化，讓島（或島的一部分）的位置產生不一樣的價值與意義。歷史的發展與解釋，也因此有了不同的角度與啟示。<sup>100</sup>從大時空尺度鳥瞰，16世紀中葉以來的東亞國際局勢發展，讓北臺灣在貿易航道中逐漸突顯其地位。我們所熟知的北臺灣馬賽人，即在此脈絡中突顯出不同的

99 對比於Tappari是沙巴里，亦有以讀音接近而將Kimauri視為金包里的說法。見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106 - 111。反對者則視Tappari為18世紀以來文獻中的金包里社、Kimauri為大雞籠社，其主要論點為17世紀的Tappari、Kimauri所在地對應於18世紀恰為金包里與大雞籠，屬時間變動但空間連續（不變）的概念。不過，若將Kimauri視為金包里，對歷史過程的解釋，將是雞籠一帶的Kimauri於17世紀自Tappari獨立分出後，於18世紀時擴張至Tappari原有的地域（即金山鄉一帶），而留在雞籠一帶的Kimauri人則成為文獻中的大雞籠社；屬時空間都變動的概念。

100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頁447。



歷史圖像。<sup>101</sup>從微觀的角度來看，17世紀時西班牙人、荷蘭人的進駐北臺灣，讓雞籠的地位突出，也造就了Kimauri人與我們故事主角Theodore的一生。

大航海時代是充滿機會、人群流動的時代，17世紀初的北臺灣即為此縮影。但另一方面，前現代的殖民地社會雖有其控制上的局限，但從底層人物的生活史中，仍可看出殖民地的陰影烙印在其身影上。面對外來的勢力，底層人物的生存策略從集體對抗、個別反抗、個別妥協、體制內競爭等方式無所不包；<sup>102</sup>17世紀初的北美原住民部落領袖Opechancanough，透過族人的集體力量與歐洲人一較長短，即為集體對抗的例證。<sup>103</sup>這也讓我們想到17世紀時享有中晝王（Keizer van Middag）稱呼的大肚王（Quataong）甘仔轄（Camachat Aslamies）與其族人，係如何與節節逼近東印度公司周旋。<sup>104</sup>不過，底層人物並非全然以族群背景來劃分，流落北美殖民地的荷蘭人Jacob Young，即是在體制內求生存的案例。<sup>105</sup>臺灣方面，曾擔任荷蘭改革宗教會探訪傳道的新港社女子Tagutel荷蘭籍夫婿范勃亨（Joost van Bergen），其個人史也呈現類似的圖像。<sup>106</sup>

另一方面，歷史敘述若過於拘泥於史料記載，有時往往會過度強化

101 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與原住民〉，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頁45-80；又收於氏著，〈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年），頁43-75；康培德，〈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臺灣史研究》10.1（2003年），頁1-32；José Eugenio Borao, op. cit., pp. 53-101；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頁93-169。

102 Gary B. Nash and David G. Sweet,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David G. Sweet and Gary B. Nash, eds., *Struggle and Survival in Colonial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1-13.

103 J. Frederick Fausz, "Opechancanough: Indian Resistance Leader," in David G. Sweet and Gary B. Nash, eds., op. cit., pp. 21-37.

104 翁佳音，〈被遺忘的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42.4（1992年）：145-188；又收於氏著，〈異論臺灣史〉（臺北：稻鄉，2000年），頁51-95；中村孝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頁71-102。

105 Francis Jennings, "Jacob Young: Indian Trader and Interpreter," in David G. Sweet and Gary B. Nash, eds., op. cit., pp. 347-361.

106 康培德，〈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歐亞跨族群婚姻：臺南一帶的南島語族案例〉，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II》（臺南：臺南縣政府，2010年），頁68-73。

殖民者，將土著視為被動的弱者，<sup>107</sup>忽略其遊走於結構中的可能性，也淡化與對立面連結的社會網絡對歷史發展的影響與解釋。Theodore的故事也許不完美，但他的確善用17世紀歐洲人為北臺灣帶來的歷史機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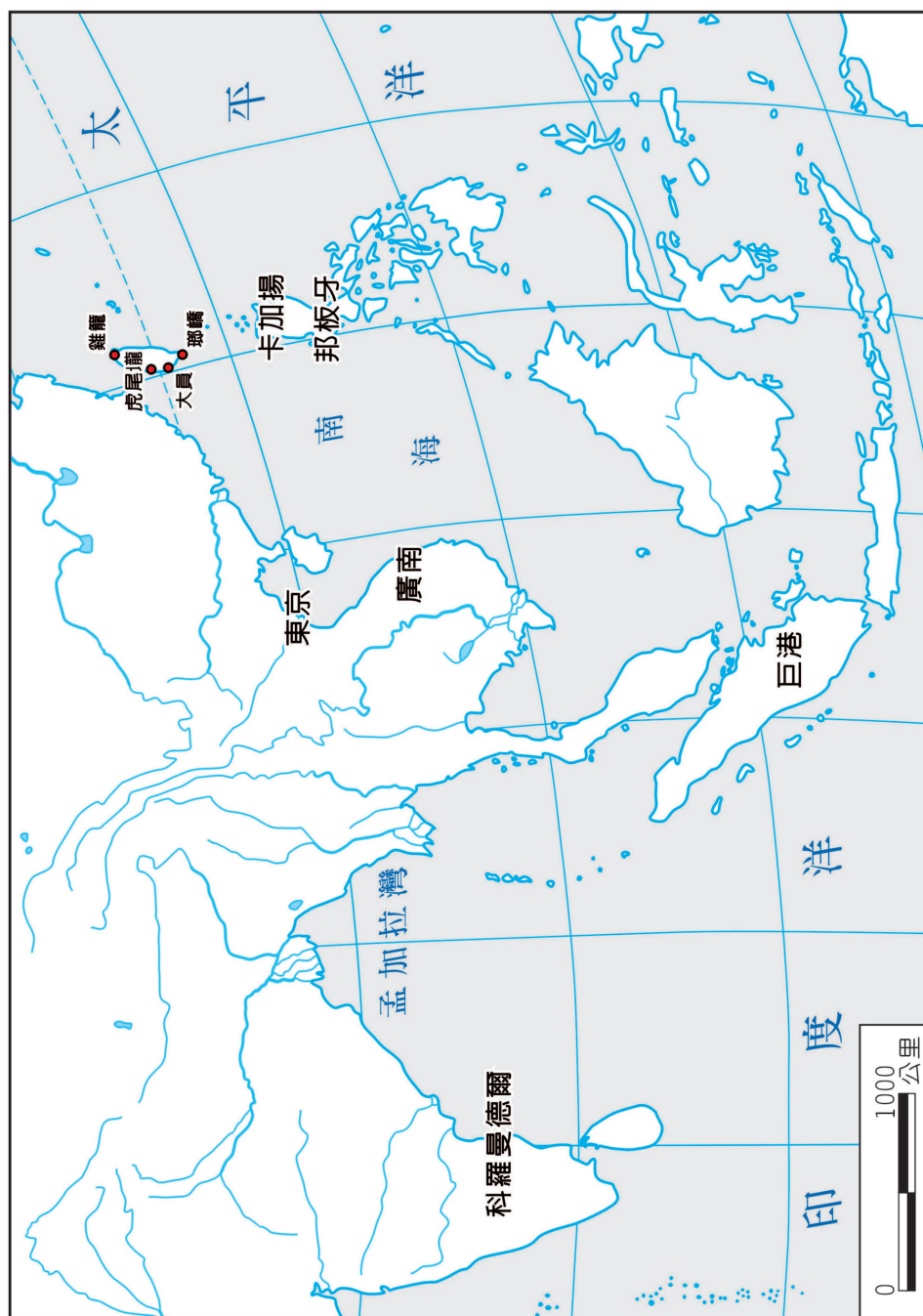


圖1 相關地名圖



圖2 相關原住民村社圖

雖不見得會成為東印度公司統治北臺灣時不可或缺的人物，但其一生卻拼湊出當時北臺灣社會的縮影。

## 引用書目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

- 1997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出版社。
- 2002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臺北：稻鄉出版社。

江樹生（譯註）

- 2000 《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 2002 《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 2003 《熱蘭遮城日誌》，第3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 2011 《熱蘭遮城日誌》，第4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翁佳音

- 1992 〈被遺忘的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42.4：145 - 188。
- 1996 〈歷史記憶與歷史經驗：原住民史研究的一個嘗試〉，《臺灣史研究》3.1：5 - 30。
- 1998 《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 1999 〈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與原住民〉，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45 - 80。
- 2005 〈十七世紀東亞大海商亨萬（Hambuan）事蹟初考〉，《故宮學術季刊》22.4：83 - 102。
- 2008a 〈新港有個臺灣王——十七世紀東亞國家主權紛爭小插曲〉，《臺灣史研究》15.2：1 - 36。
- 2008b 《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
- 2008c 〈蕃薯圖像的形成：十六、十七世紀臺灣地圖的研究〉，「空間新思維——歷史與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11月7日－11月8日。

## 康培德

- 2003 〈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臺灣史研究》10.1：1 - 32。
- 2005 《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荷西明鄭時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06 〈理加與大加弄：十七世紀初西拉雅社會的危機〉，葉春榮（主編），《建構西拉雅研討會論文集》。新營：臺南縣政府，頁81 - 96。
- 2008 〈紅毛先祖？新港社、荷蘭人的互動歷史與記憶〉，《臺灣史研究》15.3：1 - 25。
- 2010 〈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歐亞跨族群婚姻：臺南一帶的南島語族案例〉，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II》。臺南：臺南縣政府，頁55 - 75。

## 曹永和

- 1979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2000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陳 第

- 1964 (1617) 〈東番記〉，《流求與雞籠山》，文叢196。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89 - 92。

## 陳宗仁

- 2005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2010 〈西班牙佔臺前期的臺灣知識與經營困境：依據1632年傳教士Esquivel報告的分析〉，「臺灣涉外關係學術研討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9月17日－9月18日。

## 郭輝（翻譯）

- 1970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1冊、第2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程紹剛（譯註）

2000 《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鄭維中

2004 《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臺北：前衛。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

2007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

韓家寶（Heyns Pol）（著）、鄭維中（譯）

2002 《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

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著），Nakao Eki（譯）

2008 《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1626 - 1644）：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北：南天。

Andrade, Tonio

1997 “A Political Spectacle and Colonial Rule : the Landdag on Dutch Taiwan, 1629 - 1648,” *Itinerario* 21.3 : 57 - 93.

2008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lussé, Leonard

1990 “Minnan-jen or Cosmopolitan? the rise of Cheng Chihlung alias Nicolas Iquan,” in E. B. Vermeer, ed.,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eiden : Brill, pp. 245 - 269.

1993 “Pieter Nuyts (1598—1655) : een Husterse burgermeester uit het Verre Oosten,” *Zeeuws Tijdschrift* 43.6 : 234 - 241.

Blussé, Leonard, W. E. van Opstall and Ts'ao Yung-ho (eds.)

198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 1629-1641*. Gravenhage : M. Nijhoff.

- Blussé, Leonard,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1995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Gravenhage : M. Nijhoff.  
 199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I, 1648-1655*. Gravenhage : M. Nijhoff.
- Blussé, Leonard,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2000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V, 1655-1662*. Gravenhage : M. Nijhoff.
- Blussé, Leonard,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ch (eds.)  
 1999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 : 1623-1635*. Taipei :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 Blussé, Leonard and Natalie Everts (eds.)  
 2000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I : 1636-1645*. Taipei :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6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II : 1646-1654*. Taipei :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10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V : 1655-1668*. Taipei :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 Borao, José Eugenio  
 2009 *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1626-1642 : The Baroque of a Renaissance Endeavor*.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Borao, José Eugenio, Pol Heyns, Carlos Gómez and Anna Maria Zanduetta Nisce (eds.)

2001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 1582–1641*. Taipei : SMC.

Boxer, Charlie R.

1965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 Penguin Books.

Campbell, William M.

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 descriptions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Chen Shaogang

1995 *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 : een vergeten geschiedeni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eit Leiden.

Chiu Hsin-hui

2008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the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 Brill.

Coolhaas, W. Ph.

1964 *Generale Missiven : van Gouverneurs-generaal en raden aan Heren XVII der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deel II, 1639–1655*. 's-Gravenhage : Martinus Nijhoff.

1968 *Generale Missiven : van Gouverneurs-generaal en raden aan Heren XVII der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deel III, 1655–1674*. 's-Gravenhage : Martinus Nijhoff.

Everts, Natalie

2001 “Jacob Lamey van Taywan : an indigenous Formosan who became an Amsterdam citizen,” in David Blundell, ed., *Austro-nesian Taiwan : linguistics, history, ethnology, and prehistory*. Taipei : SMC Publishing, pp. 151 – 156.

Kooijmans, Marc

2000 *VOC-Glossarium*. Den Haag :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Nash, Gary B. and Sweet, David G.

- 1982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David G. Sweet and Gary B. Nash, eds., *Struggle and Survival in Colonial Americ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 - 13.

Fausz, J. Frederick

- 1982 “Opechancanough : Indian Resistance Leader,” in David G. Sweet and Gary B. Nash, eds., *Struggle and Survival in Colonial Americ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1 - 37.

Jennings, Francis

- 1982 “Jacob Young : Indian Trader and Interpreter,” in David G. Sweet and Gary B. Nash, eds., *Struggle and Survival in Colonial Americ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347 - 361.

Shepherd, John Robert

- 1995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Seventeenth-century Siraya*.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 no. 6. Arlington, VA :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erkenburg, P. G. J. van

- 1981 *Een Glossarium van Zeventiende-eeuws Nederlands*. Groningen : Wolters-Noordhoff.

Crooked and Embroiled : the VOC-described Theodore, the headman  
of Kimauri of North Taiwan

Peter Kang, Professor, National Dong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picture of a seventeenth century Formosan Austronesian baptized Theodore in maritime North Taiwan. Attention is given to how the said Theodore emerged from the European arrival on North Taiwan, and how he managed to profit by being a cultural broker between the Dutch and the Kavalan peoples. In addition to serving as a case history of Formosan Austronesian figure, the paper uses his story not only as a snapshot of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North Taiwan but also as an endeavor to provide a convergent explanation on historical toponomic puzzles among some scholars.

Keywords : Formosan Austronesians, North Taiwan, Early History of  
Taiwan, Bassay